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回應王國斌

Response to R. Bin Wong

doi:10.6752/JCS.201409_(19).0009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 : 黃克武(Max K. W. Huang)

頁數/Page : 79-8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回應

《文化研究》第十九期（2014年秋季）：79-84

回應王國斌*

Response to R. Bin Wong

黃克武**

Max K. W. Huang

謝謝陳國棟教授的回應，他的評論一方面把王國斌教授的內容做了清楚的摘述，同時也提出一些非常關鍵性的問題。

對我來說，要回應王教授的演講有點困難。因為我多年來所從事的研究題目都是個案式「小歷史」，不是宏觀性的「大歷史」。我開始研究清代的經世思想，是以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為個案；接下來研究梁啟超、嚴復、胡適、蔣介石、賀麟等人物的生平與思想，也是個案式的。我的老師告訴我的一句名言是：「上帝在細節之中」。我的研究取向因而傾向於從歷史細節中去掌握歷史的意義。基本上我不研究大歷史的題目，但是對於大歷史當然是心嚮往之。例如我很欣賞黃仁宇、金觀濤等先生的作品。

王國斌教授的講題屬於大歷史，他要談1750至2000年之中接近250年的歷史，其中不但處理了長期以來中國工業化的一些問題，而且在地理上包括了中國與歐洲。這樣的廣度與深度都不是我所能夠完全掌握的。但是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卻發現十分的親切。這一篇大作所處理的議題雖為經濟現象，卻不是傳統的經濟史。他和黃仁宇在

* 編者註：黃克武教授主要回應王國斌教授於中研院的演講，亦即本專題論文之第三節。

**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電子信箱：hewenkai@ust.hk

《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所說的大歷史有所不同。大家知道黃仁宇談到「十五吋的等雨線」、「數字化管理」、「高層管理」、「低層管理」等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結構性因素，以及結構的延續性等。另一方面，此文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如階段發展、下層決定上層等說法，也截然不同。

王教授的文章中首先反駁了幾個過去歷史的研究典範，包括從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挑戰與回應說」、現代化理論（也包括五四話語）等，然後在此基礎之下他提到如何重新理解大歷史的一個可能性。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是：首先他把人跟觀念納入到傳統的經濟史之中，而他所談的產業、結構、制度等背後都有人的因素在其中，包括當時的人們怎樣理解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與如何面對的挑戰而提出對策等。

其次我覺得王教授所談的內容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打破過去很多種二元對立的說法。二元對立包括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新與舊的對立、官與紳對立、商人與士紳的對立、城鄉的對立，還有就是農業、手工業跟工業之間的對立等。在打破了二元對立的說法之後，我們更能看到中國特殊情況之下各部門之間的交織互動。對於思想史研究者來說，從張灝先生開始提出「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的一個解釋架構，用來說明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我認為這個轉型時代的觀念可以配合王教授的說法。

這一次演講中王教授所處理的範圍主要從清中葉到20世紀，這段期間的後半部也是我研究的對象。王教授特別強調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不是一個「取代」的過程，而是慢慢的在傳統的邏輯之中演變。這種邏輯不單是包括一種社會、經濟的安排，也包括王教授所講的新的可能性，如人與思想的因素。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王教授特別著重的250年中，有一個以傳統內在的肌理為中心而展開的變化，此一變化不但有思想觀念的變化，也有傳統制度與結構性的面向在這個過程裡面逐漸融入了新的因素，而展現出一個新的局面。王教授很喜歡用的說法是: old logic, new subject或new

situation等。我覺得這個說法也跟我的老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的想法有類似之處。墨先生第一本書談清代官僚組織《清代官僚的內在組織：法律、規範與溝通的面向》(*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1973)，第二本書《擺脫困境：宋明理學與中國演變中的政治文化》(*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1977)，這兩本書其實都牽涉到組織的轉變，跟思想觀念（特別是宋明理學）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覺得墨先生所提出來的一些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配合王教授的觀念。墨先生在《清代官僚的內在組織》一書裡面他用《處分則例》來看清代的法律跟清代官員，嘗試指出清代的官僚有一種類似西方「新教倫理」的probationary ethics（待罪倫理）。我們可能不確切知道此一倫理在這個歷史過程裡面扮演什麼角色，但是無疑地這種傳統的精神動力在他們解決新的世界的挑戰中扮演著一個不容忽略的角色。墨子刻教授在《擺脫困境》一書中又講到，當晚清知識分子在觀念化他們面臨新的情境的時候，他們追求的「目標」多半是來自傳統。在西力衝擊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西方提供很多新的「方法」來幫助這些知識分子實現傳統的理想。我覺得對於清末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價值取向，而這些源於傳統的價值取向影響到他們對於工業化過程中採取的策略跟努力的方向。這個部份是我從思想史的角度讀來特別感到趣味，而發現王教授的說法與他人的研究能相互發明。由此可以看到王教授所採取的大歷史的路徑，一方面擺脫過去結構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式，另一方面也擺脫了現代化理論中傳統、現代的二分法，而從一個更新穎的角度來處理長時段的演變下中國工業化的重要課題。

接下來我想回應一下國棟先生所談到的幾個問題，我覺得他點到的幾個問題都很重要。首先從題目的industrialization（工業化）這個字開始，因為我研究近代中國詞彙翻譯的歷史，我覺得各種的關鍵詞彙需要了解其歷史與內涵，亦即需要解開(unpack)詞彙之中到底包含了什麼東西，並了解其變化。王教授的題目為industrialization，

誠如陳國棟教授所指出的，當我們把industrialization的意涵加以剖析時，會發現此一詞彙其實並不是一個定義很清楚的觀念。尤其當我們將它放在一個長遠歷史發展之中來看的話，在不同階段所指涉的內容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剛才陳國棟教授用「浮動性的了解」來說明，我認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陳述。無論如何，在這個浮動的過程裡面，到底什麼是industrialization？這可能需要進一步來釐清。同時，industrialization跟晚清很多人所說的「實業」是否相同（如孫中山有「實業計畫」），也是一個值得好好考慮的議題。

第二點是，陳國棟教授談到很多比較性的問題。這讓我想到王教授在這篇文章的篇名裡面，使用了China and Europe。我想問的是：「and」是什麼意思？因爲我覺得王教授很明顯的不是要比較，更不是用一個目的論的過程來比較，他的作法可能是「對照」(contrast)，而對照裡面與中國經驗相對比的對象，有時候是歐洲、有時候是回教世界。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將中國的經驗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之中來考察？對照之後如何呈現中國的特點？這些部份讀者還需要解惑。

第三點陳國棟教授談到「富強」跟「民生」的兩個概念，王教授的文章裡面也談到這兩個概念，我覺得這兩者有重要的區別。當清末時，「富強」的確是一個很核心的議題，王教授對這議題有相當深入的分析。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有關嚴復的書(*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也強調「富強」對於清末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富強」跟「民生」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再思考。如果說「富強」是以韋伯(Max Weber)所說工具性理性爲基礎所追求的「現代化」，那麼「民生」並不完全等於富強，而具有一層價值的意涵。民生爲中國傳統的觀念，不只能溯源到250年前，甚至有更深遠的傳統。在industrialization的過程之中，民生所發生的作用爲何？此一作用是否造成了所謂「中國特色」？這些問題都值得再作挖掘。

第四點是談到1904的St. Louis博覽會，王教授指出展示的內容，基本上是工藝而不是工業。中研院近史所的同事王正華的一篇文章，

airiti

注意的反而是另外一個面向。王正華論文的標題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21-475。這牽涉到，如果要討論1904年St. Louis博覽會，或1897年Chicago、1850年London博覽會，這些博覽會的意涵或許並不能直接等同於現代的工業展示，而有其他的意義。博覽會在當時人心目中所具有的意義可能也需要再做思考。對於晚清的人來說，其一方面展示中國目前生活的狀況，另一方面也是展示文化性的中國。這一個部份的分析可以放在經濟以外更廣的視野之中來觀察。

第五點，陳國棟教授談到經濟政策跟經濟活動之領導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到底晚清有沒有經濟政策？我們知道當時有政府所主導的經濟政策，例：官督商辦，如張之洞、李鴻章的理念等，有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之決策。但是如何來看這些經濟政策和其有效性，仍值得再思索。對於某些經濟史學者來說，他們所看到的顯然不是很清楚的政府所主導的經濟政策，領導著大家朝著一個明確的方向去努力；反而他們看到的是很零散的歷史圖像。這兩種構想似乎是不同的處理近代以來經濟發展的方式，這方面究竟如何，仍值得加以釐清。不過我認為至少在自強運動期間，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中心，還是有很強的經濟規畫，特別像福州造船廠、船政學堂等，都是規劃非常完善的機構。

這也涉及我們討論從晚清到20世紀之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變化即蘇聯因素與國營化、集體化經濟的影響。我們前一陣子在近史所談「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的時候，日本信州大學的久保亨教授在〈蘇俄在戰時中國：重慶國民政府經濟專家眼中的蘇聯經濟〉一文中也談到20世紀之後，中國開始有一些新的經濟政策，其中有一部份是受到俄國的影響。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論點。例如20世紀中國對日抗戰（1930-40年代）期間，在中國有一批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的學生，控制了資源委員會，他們以國營化的方式從事了

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及資源的壟斷，這樣的情況顯然跟中國之後的發展有一定的關係。到了50年代以後，胡適開始用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來抨擊國有化的路向，主張在台灣應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自由經濟路線。1949年以後的大陸則採取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我想這近百年來的經濟發展，除了傳統的延續之外，也有一些新的變化，而這些新的變化跟20世紀中後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